

吴越剑铭拓本考证二则*

马晓稳

内容摘要:本文考证了金文拓本著录中的两个问题。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者旨於賜剑旧有两种不同的拓本,之前不少著录都误以为是两柄不同的越王剑。我们辨识出了其中一种是一个“错误”的拓本。程瑶田《通艺录》中提及司马达甫收藏的一柄古剑,我们认为即是著名的吴王夫差剑。通过对司马达甫卒年的考证,可知司马达甫是目前所知该剑的第一个收藏者。程瑶田《通艺录》较早辨识出活字模痕并描摹出来,是该剑早期著录中的一个重要摹本。

关键词:拓本 者旨於賜剑 吴王夫差剑 程瑶田

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出土,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已成为一股重要的学术潮流,出土文献的解读也成为当下文史哲等领域科研创新的主要推手。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对出土文献资料著录来源的校勘考证是相关学科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因为利用不准确的材料得出的结论,其可信度必然大大降低。梳理古文字资料著录的历史脉络,应是出土文献研究的必要学术准备。本文以两则金文拓本的考证为例,谈谈古文字著录中的两个问题:一是对同一器物不同拓本的考察,辨识出其中的错误;二是根据清人著作补充器物的一个重要摹本,并据此考证出该器流转脉络。

一、国博所藏者旨於賜剑拓本辨伪

吴镇烽先生编著的《铭图》第33卷收录了一把越王者旨於賜剑(编号为17881),著录信息为:

《燕京学报》23期《鸟书三考》图5越王剑二乙,《中山大学学报》1964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吴越文字资料整理研究”(18CYY037)的阶段性成果。

年1期《鸟书考》图6,《录遗》594,《鸟虫书》图35,《鸟篆编》下158,《集成》11600,《铭文选》554,《总集》7699,《辞典》969,《安徽金文》136,《吴越文》131,《国史金》2789。^①

收藏信息为:“原在北京尊古斋,原藏黄濬、于省吾,后归上海博物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剑拓本如下揭,下文记作A。



正面



背面

A

同卷233页亦收录了一把越王者旨於賜剑(编号为17887),著录信息为:《铭文选》554,《吴越文》132,《鸟篆编》下81。

现藏地点未交待,拓本如下,记作B。



正面



背面

B

A、B两拓最直观的差别在于:A剑格一端残缺,而B剑格完整。

B图最早著录于《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二)》^②,不过收藏地点却标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鸟篆编》第一次同时收录了A(158号)、B(81号)两图。其中158号器著录信息为《尊古斋古兵精拓》。从《铭图》著录信息可知,A剑最早为黄濬“尊古斋”所有,《尊古斋》一书即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据黄濬拓本影印,其实应是该剑最早的拓本。可以肯定,《鸟篆编》158号器就是《铭图》的A剑。有意思的

①吴书著录信息为简称,具体可参看文末简称表。

②上海博物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编写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二)》,文物出版社,1987年,以下简称“《铭文选》”。

是,该书81号著录的拓本为B图,收藏地却标作“中国历史博物馆”,著录信息也多与《铭图》A剑相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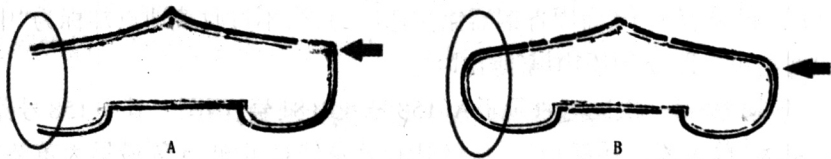
《吴越文》131、132号分别收录了A、B两拓。并云:“旧多将越王者旨於賜剑一、二(引者按:即131、132)两件视作一器,从剑格铭文拓本观之,显然不妥。《鸟篆》(引者按:即本文《鸟篆编》)分别为二,当是。”

为便于理解,我们把上面梳理的内容用表格写出来:

内容 书目	书内编号及 拓本信息	以往著录信息 ^①	现藏地点
《铭文选》			
	554 (B图)	《鸟书三考》、《录遗》、《鸟书考》	中国历史博物馆
《鸟篆编》	158 (A图)	《尊古斋》	
	81 (B图)	《鸟书三考》、《录遗》、《鸟书考》、《铭文选》554	中国历史博物馆
《吴越文》	131 (A图)	《鸟书三考》、《录遗》、《鸟书考》、《铭文选》554、《尊古斋》199页、《鸟篆编》158等	中国历史博物馆
	132 (B图)	《铭文选》554、《鸟篆》81	
《铭图》	17881(A图)	《鸟书三考》、《录遗》、《鸟书考》、《鸟篆编》158、《铭文选》554、《吴越文》131	中国国家博物馆
	17887(B图)	《铭文选》554、《吴越文》132、《鸟篆编》81	

经查,表中《鸟书考》、《尊古斋》、《录遗》、《鸟书三考》等书著录的相关拓本一侧都是残破的,也就是说,早期出版物中只著录了A图,未见B图。但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后来出版物中B图的著录、收藏等却又都与A图相关信息纠缠不清。

A、B两图的主要差别在于剑格外形:1、A剑格一端残缺,而B完整。2、A剑格两侧上端边缘为尖角,而B剑格呈圆弧形。



我们认为,B拓本应是在A拓本基础上修描而成的。理由如次:

其一,从铭文内容看,A、B“越王”二字写法相同而与其他者旨於賜剑有异。A、B“越”作“郢”,不同于一般作“戊”。而“王”字也与越地鸟虫书的通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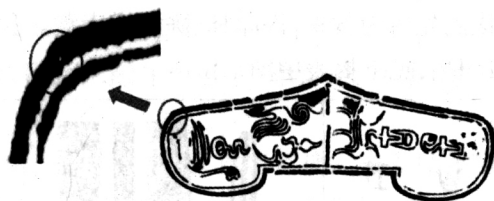
①原书著录信息除了表中列举的,还有一些。为节省篇幅且便于读者看出问题,这里我们只选取与本文讨论有关的。为统一计,著录简称做了相应的调整。

写法不类,如下表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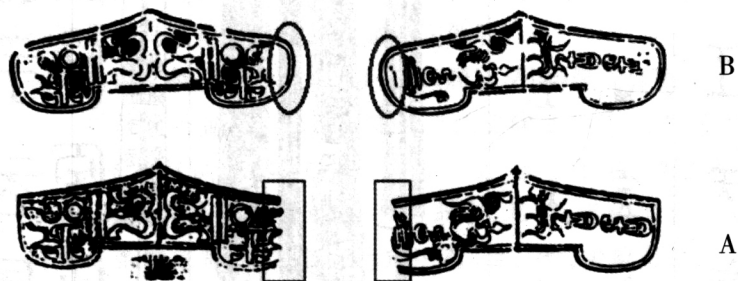
A、B 拓本写法	
其他越王剑写法 ^①	

其二,目前所见全部越王剑剑格左右两端上部都没有作圆弧状的。也就是说,找不到一把类似B剑格外形的越王剑。

其三,B拓本一端放大,还能看到笔画接续不连贯的痕迹,起笔处正是A拓本未能拓出的地方。



其四,B拓虽然剑格外形完整,但是两端铭文都有残缺。这也恰恰是A拓未拓清的地方。



综合上述几点考虑,笔者以为根本不存在B拓的越王剑。B拓只不过是A拓修描产生的一个“错误”拓本。致使以后的著录如《鸟篆编》、《吴越文》、《铭图》、《吴越题铭研究》^②都误以为是两把不同的越王剑。综之,A、B是同一柄越王剑的两个不同拓本。最早应是《铭文选》刊布了B拓,该剑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B拓是不真实的,今后的金文著录不应再收入。

二、吴王夫差剑的文献学考察

清代毕沅、阮元主编的《山左》中著录了一把“天水剑”:

右剑长一尺四寸三分,博一寸四分,与《考工记》所言中制差小,较匕首甚大。铭十字,曰:工□王天调自作其天水。义不可尽解。意者王

^①具体可参看曹锦炎,吴毅强编著:《鸟虫书字汇》,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4-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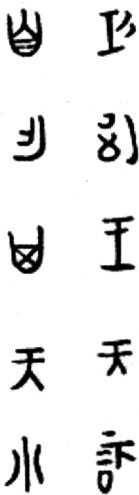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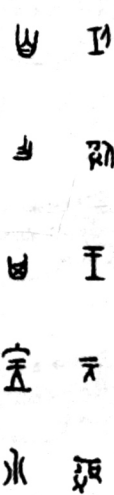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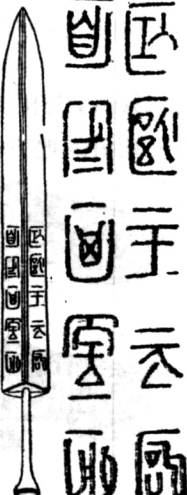
^②董珊著:《吴越题铭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

某乃工之姓名,天水其剑名也。王、自、水字小篆;工、调、作、其等字俱古文;天字近正书。钱唐黄司马易购于济宁。定为西汉器。

不久,阮元在《积古斋》中对上述考释做了部分修改:

右宝用剑,铭十字,磨灭者二字。黄小松所藏,器据拓本摹入。案,宝用旧释作天水,误也。

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学者对铭文内容一直未得其解。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山大学张振林先生著文考证铭文当释作“攻(工)敌(吴)王夫差自乍(作)其元用”^①,人们方才知晓,原来这是一柄珍贵的吴王夫差剑。该剑今重新著录于《吴越文》074、《集成》11636、《铭图》17933等。从三书标明的旧著录和收藏者来看,该剑先后为黄易、许印林、陈介祺皮藏。我们从旧著录中甄选几幅重要的旧摹旧拓,见下揭表中图a、b、c:

			
a《山左》	b《积古斋》	c《郁华阁金文》 ^②	d《通艺录》

程瑶田《通艺录·桃氏为剑考》中著录了一柄“中士之剑”,与上文讨论的吴王剑相较,器形、铭文高度一致,见上表图d。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者文字周围都有小方框。这种留有活字印模痕迹的,至今为止,吴国铜器中也仅此一见^③。故可肯定,《通艺录》中所摹录的正是前文讨论的吴王剑。只不过

①张振林:《关于两件吴越宝剑铭文的释读问题》,《中国语文研究》第7期,1985年。

②盛昱编:《郁华阁金文》,《金文文献集成》据手稿影印,线装书局,2005年。

③《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1337又收录了一柄带活字模的吴王剑,经比对,很可能就是本文讨论的这柄(《铭图》17933),所以我们认为吴国铜器中带活字模的仅此一件。

由于《通艺录》并非金石著录,且在很长时间内剑上铭文不能尽识,故百年来一直鲜有措意者。

程瑶田云:

江宁司马达甫舍人有中士之剑。剑身近腊处铭十字,两行。每字为小长方空以局之,笔画甚古,疑古文之在籀文前者。^①

以上文字中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由“每字为小长方空以局之”可知程氏已意识到文字外围的方框并非笔画,这在早期著录中是非常难得的。其二,以为文字“笔画甚古,疑古文之在籀文前者”。其对器物时代的判定,也较《山左》断为西汉器更显合理。其三,透露收藏者为“江宁司马达甫”。这一说法从未见于其他著录,下文着重讨论这个问题。

《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中收录了一则翁氏为司马达甫藏剑所作的《跋剑铭》:

铭文十字,惟“自作其用”四字可读。未谷以为“其”字为“旗”,秋史以为非是,当以秋史说为是也。余当详考之。辛亥七月十七日。^②

从程、翁二氏的记载来看,这柄夫差剑确实曾藏于司马达甫,且乾隆辛亥(1791)剑主是司马达甫。其时,许印林、陈介祺皆未出生,所以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司马达甫与黄易的收藏孰先孰后。

司马达甫文献上记录不多,以钱泳《履园丛话》最为详赡:

司马达甫,江宁人,河东河道总督駒之公子,中乾隆癸卯(1783)副车,以甲辰召试,钦赐中书。坦白无疵,汲古不倦,常收藏汉铜印谱最多,用顾从义集古印谱之例,分为职官、私印,而私印又分为四声,凡十六册。余游京师,尝寓其家为定甲乙,后一年,中翰忽病没,年才三十二也。^③

根据上述文字可得两点新知:司马达甫名亶,其父为河东河道总督司马駒。孙星衍为司马駒撰写的墓志中曾提及该子,检《故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提督军务资政大夫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司马公駒墓志》:

子亶,副榜贡生,召试举人,内阁中书。好古有文,早卒。^④

由是又可知:司马达甫早于其父先卒。司马駒《清史稿》有传^⑤,歿于嘉庆四年(1799)。钱泳游京师后一年,达甫病没,而《梅溪先生年谱》中,在1791-1798年之间,恰有一则钱氏入京的记载:

①程瑶田撰:《通艺录·桃氏为剑考》,嘉庆八年(1803)刊刻。

②翁方纲撰,沈津辑:《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68页。

③钱泳撰:《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第588-589页。

④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八九,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23-928页。

⑤赵尔巽等编:《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11367-11368页。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六月抵京,同孙渊如游陶然亭,寻辽寿昌二年石幢。同沧州张桂岩游圆明园,至虎圈观虎,至象房观象。十月出京,十一月回抵锡山。^①

综合以上条件,司马达甫当卒于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早于黄易9年。司马达甫应该是目前所知这柄吴王夫差剑的第一个主人,司马达甫卒后,剑为黄易所得。流转顺序应是:司马达甫、黄易、许印林、陈介祺。

最后附带说一下,《集成》以为该剑现藏于哈佛大学福格美术博物馆,但哈佛所藏夫差剑不管是器形还是文字都与旧拓不类,故《铭图》另立为17934号。其实张光裕、王恩田两位先生早已指出,哈佛夫差剑是据阮元《积古斋》摹本伪造的^②。这柄吴王剑下落如何,藏于何处,多年来一直没有确切讯息。最近出版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第四册公布了一柄某藏家私藏的吴王夫差剑^③,著录号为1337,从公布的器形和铭文的照片看,很可能就是本文讨论的这柄失传已久的司马达甫旧藏。

附记:本文投递《文献》后,外审专家帮忙进一步核实了国博者旨於锡剑的收藏、著录情况,蒙外审专家慨允,现将相关文字转引如下:

就此问题,我专门请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的友人进行核查。国博的田率先生帮我查看了他们馆的收藏账目,反馈的信息是:《铭图》17881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1959年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调拨,长55.8厘米,重0.86千克。未察验实物。上博葛亮先生回察了《铭文选》的存档资料,并与馆中拓片师仔细辨别,形成意见如下:1.《铭文选》2.554存档资料为照片3张,背面及资料袋均作“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暂未见拓片;2.存档照片呈现情况与最终印刷效果(按:指《铭文选》)相同;3.《铭文选》2.554与《集成》11600当出自同一器;4.《铭文选》2.554图像失真较严重,外框、中脊、镶嵌情况与《集成》11600差别较大,但文字形态相同。《铭文选》2.554既可能是在拓片上补绘的,也可能是在拓片上摹出来的摹本。不论是以上哪种情况,它跟《集成》11600有差别的部分,应该都是画出来的。经拓片师再三确认,《铭文选》2.554图像不可能全部是拓的,要么是在拓片上画加涂白粉修改出来,要么完全是画的。葛亮先生还说:“《铭文选》的来源很明白,只要没有旧著录的,就

①胡源、褚逢春编:《梅溪先生年谱》,《乾嘉名儒年谱》第1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353-426页。

②王恩田:《吴王夫差剑及其辨伪》,《吴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47-153页。

③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08页。

是在各博物馆拓的。现在看来又多了一种,是各博物馆提供了一些图版。”6月4日,就三张存档照片,我跟葛亮先生再次确认有关信息时,他回复我说:“《铭文选》留档的照片看起来就跟书上一样,是翻拍的修过的拓本或摹本,背面是现藏地和序号。这把剑的三张照片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综合看来,A拓著录、收藏线索明确,B图则最早著录于《铭文选》,但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提供给《铭文选》的图版究竟是怎么来的,尚需作进一步研究。

从葛亮先生提供的信息来看,我们对国博藏者旨於錫剑两种拓本的判断是正确可信的。本文初稿曾认为“最早应该是《铭文选》修描了原拓”,现在看来并不一定,诚如外审专家所言,B图从何而来尚需进一步核实。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供修改意见并帮助核查,感谢田率先生、葛亮先生。

本文引用金文著录书简称表:

《山左》——毕沅、阮元撰:《山左金石志》,嘉庆二年(1797)小琅嬛仙馆刻本。

《积古斋》——阮元编:《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嘉庆九年(1804)阮氏刻本。

《录遗》——于省吾编:《商周金文录遗》,科学出版社,1957年。

《总集》——严一萍编:《金文总集》,艺文印书馆,1983年。

《铭文选》——上海博物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编写组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二)》,文物出版社,1987年。

《尊古斋》——黄濬编:《尊古斋古兵精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此书据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原书稿本影印。

《鸟篆编》——曹锦炎、张光裕主编:《东周鸟篆文字编》,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

《辞典》——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5年。

《安徽金文》——崔恒昇:《安徽出土金文订补》,黄山书社,1998年。

《吴越文》——施谢捷编著:《吴越文字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鸟虫书》——曹锦炎著:《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

《国史金》——王献唐著:《国史金石志稿》,青岛出版社,2004年。

《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增订修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

《铭图》——吴镇烽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作者简介】马晓稳,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